

烈火中的情与爱

——中国百年小说中的革命母题研究

赵天才 著

LIEHUOZHONGDEQINGYUAI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烈火中的情与爱

——中国百年小说中的革命母题研究

赵天才 著

嘉兴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LIEHUOZHONGDEQINGYUAI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火中的情与爱:中国百年小说中的革命母题研究/赵天才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2

ISBN 978 - 7 - 216 - 06252 - 7

I. 烈…

II. 赵…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8879 号

烈火中的情与爱

——中国百年小说中的革命母题研究

赵天才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1

版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9 千字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252 - 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自序

费正清老先生说,20 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在这个百年里,国家、民族以及平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革命发生了关系。而在文艺的殿堂里,革命故事则成了表现的重头戏。从世纪初流行的鉴湖女侠,到近期革命题材影视剧的盛行,时光虽已跨越了一个世纪,但是老百姓关注的热情并未衰退,甚至有些革命经典题材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搬上荧屏,重导重演之风不断。世纪百年的文学存在如此奇妙的景观,这不能不让人兴奋。

基于这个原因,本人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以飨读者。本著以中国 20 世纪小说中的革命母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建国十七年的革命小说为中心,上引自民国初期的革命小说、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带有革命母题的小说,如茅盾的《蚀》三部曲、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以及延安时期的创作,如赵树理、孙犁、丁玲的小说,下延至新时期的革命题材小说创作,如《地球上的红飘带》、《皖南事变》等,及 80 年代中后期对革命宏大叙事进行消解的新历史小说,以及 90 年代大众文化语境下出于消费、怀旧等目的对革命故事的再想象。本书以小说叙述革命故事为纲,一方面考察中国 20 世纪小说叙述革命故事的话语嬗变及文化语境的更迭;另一方面深入到文本深处,以细读的方式深入研究革命话语与家庭伦理、性别伦理、生命伦理,以及叙述革命与历史意识、革命故事与文化消费等的关系。叙述革命是一个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命题,本著所指涉的革命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凡涉及到革命母题的,都作为革命叙事纳入研究范畴。小说叙述革命,理所应当

然地离不开对革命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所以,小说叙述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叙述革命境遇中人的伦理状况,它既包含了革命主人公的欲望、兴趣、目的及革命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涵盖了革命背景下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以及对革命的大恐惧与大欢欣,当然也不乏叙述者所持的价值立场与叙事姿态。

文学是透视时代的窗口。革命故事在不同时期的叙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面孔。透过这一张张面孔,我们仿佛看到了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个时代所流行的价值立场以及艺术审美旨趣。所以,讲述故事的年代所透露的信息,某种意义上讲,其内容或许更鲜活于故事讲述的年代。本著对世纪百年小说里的革命母题研究,初衷即是想通过它来掀开时代面纱的一角,也幸好只是一角。因为有关该类型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的契入点,诸如革命者的宗教情结、革命的原型理论等,即使本著中所论及的角度,其实还远不够深入。圣人云: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大嚼大咽的著作,或许太仓促了些,然而这也正是讲述故事年代的故事。是为序。

2009年12月

前言 革命与叙述

查特曼将叙述文本分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两层次,故事层面包括动作、发生事物、人物、场景等方面的内容,而话语则是“这些内容得以传达的表述方式”,由此,“叙述什么”与“怎样叙述”形成了两分法。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话语本身”是有组织的有目的信息,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是一种典型的修辞方式,热奈特从这种修辞方式里看到了叙事交际场合的各类参与者包括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人物及隐含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叙述策略。各类话语无疑都是历史与现实权力的运作过程,话语结构的主要因素是各式各样的陈述,而控制陈述的则是一种权力关系。所以,福柯心目中的“作者”不单纯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角色,一种功能。作者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话语系统。无疑,革命叙述与革命故事是两回事,按照许多论者的解释,世上一切事物在尚未被人诉诸语言时,它应该是故事(story),而一旦被语言表述后,即成为了叙述(narrative)。叙述业已成了我们的一切^①。20世纪的中国小说,在叙述革命故事时,经历了太多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不同时代的话语权力组合与体系,所形成的革命叙述形式、修辞方式、主题价值、人物形象等,都存在极大的差别,福柯曾在其《知识考古学》里说,对陈述的分析是一种历史的分析,是一种避免一切释义的分析;它不去问那些被人说过的话里深藏着什么意义,什么是那

^① 唐小兵:《当代叙事学·译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译本,第324页。

些话里非自觉的“真正”意义,或者什么是含而未露的因素,等等,它要知道的是这些话语的存在形式,其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福柯的话,确实适宜对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有关革命故事讲述的分析。因为世纪百年的中国,经历太多的权力机制的转换。从五四激越的反传统,到辛亥革命后知识者的沉落,再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极度兴奋,以致于国共一次合作破裂后的极度消沉,知识者情绪的起起落落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末,叙述话语背后权力的更迭,丰富了革命故事的叙述,形成了一道道异常瑰丽的文学风景,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探讨。

一、叙述革命

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里的最为显赫的题材,革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利用小说来叙述革命成为了 20 世纪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特别是自建国至 70 年代末,在继续革命的前提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革命母题,作为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因子,革命母题成为了该时期文学表现主题或情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且评论者、读者常以是否具有革命性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重要条件。这种文学现象曾为许多研究者所诟病,甚至在实际研究中把这段时期的文学视为盲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极“左”的革命文学创作所包含的国家民族觉醒的意义不容忽视,故有论者指出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①? 正是因为革命所具有的民族/国家觉醒的宏大意义,因此在进入新时期后,虽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得到了有效地调整,但叙述革命并未因此遁迹。革命叙事依然在建构集体的历史记忆,并指向人民的

① 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2001 年第 2 期。

觉醒、民族的新生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叙述上的这种价值取向即使在新时期启蒙语境下，及 90 年代的大众文化语境中依然无可替代。一个民族忘却了她的历史便是否定她的现在，因此革命叙事不仅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虽然进入新时期后，个人化的反思立场开始在消解革命的宏大话语，但其主要目的仍然是想呈现被官方所保护的“荒野”，从而达到还原革命历史场景的目的。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革命话语似乎成了缺乏任何意义的能指，变成了语言符号的嬉戏，如同名小说《沙家浜》将革命历史仅仅作为了演绎性爱 and 情杀的幕景，将大众记忆中革命的阿庆嫂、郭建光塑造成奸夫淫妇。但这种消解革命历史与集体记忆的创作，却遭到了主流话语的严肃批判。许多进行商业炒作的文本虽怀着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倾向，但在讲述革命时，并未抛弃革命促进民族 / 国家觉醒的意义，如同名小说《红色娘子军》、同名电视剧《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革命无疑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场景，其间不仅可容纳黄钟大吕的雅颂之声，也可演绎丝竹管弦的靡靡之音。革命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叙事始终是文学创作的重头戏。

记得费正清在叙述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用了两个非常贴切的标题：“革命的中国”与“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革命与百年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伦理学家、文学家都对它津津乐道。革命被置于重重话语的包围之中，其本相成为了一个散漫无边的能指，有多少种话语形态，就有多少种革命图景，真所谓层层帘幕遮蔽灯。汤因比曾在考察英语 fact 这个词的起源时，认为它是从拉丁词 facta 演化而来的，而 facta 本意为“被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虚构出来的，而非实际的东西^①。汤因比对 fact 词源的考察，旨在说明事物不存在绝对的真实，它始终是被话

①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5 页。

语制造出来的。汤因比的观点固然绝对化,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革命的视角:即落实到具体实践的革命并非每个人都能亲历,我们所接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历史和现实话语实践的结果。而任何话语都包涵着相应的价值判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言说者,都会导致革命形态的差异。

革命一词的历时性演变本身即显示出话语操纵事实的强大力量。《说文解字》曰:“革,更之象”,“命,使也”。革命即谓顺承天意予以变更之意。《辞源》提到《易经》最早将革与命合用,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以顺天应人赋予暴力杀戮以最初的合法化内涵,这种传统的革命天命观显示出其意识形态虚幻化的本象。19世纪末西学东渐以及弱国子民的民族复兴情结,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革命内涵有了重新的认识,传统革命的顺天应人说被革命乃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民族存亡之要义所取代,革命成为由野蛮进入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要手段。革命话语的现代化更换了革命言说背后的元话语,但革命改换朝代的暴力实质并没发生变化。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革命的内涵再次得到丰富,其历史前进火车头的隐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无法调和的表征,都表现出从更深的社会结构来确定革命的所指,其具体形式是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消灭来表现的。从传统到现代,革命言说的背后都预置了一个黑格尔式的先验理念,只不过历史前进的标志较之天命民意似乎更具现代性逻辑^①,而且将革命置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内来言说,其强烈的实践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当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以及把绅士打翻在地,甚至用脚踏上时^②,革命开始由朝

①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代更迭、阶级斗争的宏观视角下到剥夺个体生命的微观层面。伟人关于革命的形象性描绘无疑开启了文学讲述革命的广阔视域。抽象的革命定义若从个体生命被褫夺这种角度来观照，较之天命民意、历史前进方向等宏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讲更具震撼人心的持久魅力。这也为革命从社会历史学的言说过渡到文学艺术的表现，开启了一扇洞悉之门。毫不讳言，革命是历史发展中的非常态进程，动乱、杀戮、生离死别是其表象，英雄、叛徒、多情女人是活动其间的主角，话语的言说则是革命的精髓。革命的特质决定了它是文艺表现的绝好素材，丰富多彩的历史脉络，崇高、悲壮的人生百态以及革命言说者对历史、人性的反省等，通过革命这面镜子被很好地折射出来。

文学叙述革命不同于社会历史学对革命的科学定性，文学所特有的审美性、主体叙述的情感性以及人物形象的虚构性等赋予革命言说更大的空间。譬如站在国家话语立场所讲述的革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必然，叙述上的史诗化与阶级英雄的崇高湮没了肉体丧失的悲痛，消亡的个体在集体精神的光照下永生，从而产生强烈的教化作用；站在关怀个体生命的立场去讲述，革命常被演绎成个性张扬的舞台或生命苦难的渊薮，革命导致日常幸福家庭伦理的中断，许多美好的事物因此陨落，革命故事里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关怀，且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讲法^①；而站在民间的角度去讲述，革命成了英雄的传奇、善与恶的道德较量以及阅读者日常生活的娱乐与宣泄，叙述中蕴含着粗俗而又活泼、热闹而又感伤的审美旨趣等。革命的言说，透视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审美理念以及强烈差异性的历史意识。这一点从建国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新时期以来的某些新历史小说，以及进入 90 年代，对经典的戏仿与改写及

①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4、7 页。

英雄父亲系列的小说中，可清晰分辨出不同年代的话语特征及彼此间的差异。如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现实意识形态的欲望以及时代的审美文化背景等。革命的言说是百年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也是窥视时代文学创作理念变化的一个窗口。

二、一个伦理命题

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非常形态，是话语言说的重要对象。陈建华先生在其《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中，考证了革命一语的多义性。从传统中国的《易经》里提及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赋予其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及科技与社会进步的含义，再到无产阶级把革命喻为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如1927年毛泽东对革命所作的形象描绘：“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①以及政治温和派对革命暴力性的排斥而仅将其看作社会进步的革新，等等，无疑赋予了革命作为话语言说对象的多重价值属性。革命在话语的层层包裹中，颇显得神秘与深邃。虽然革命一词意义丛生，然而回到其词源本身，却无法回避革命的暴力性特性。《说文解字》解意“革”为“马匹治去毛曰革”，故革命意味着剥夺生命如同田间刈草、皮革硝毛一般。事实上《易经》最早提到的汤武革命，虽不乏德服，然血流漂橹、尸陈遍野、杀人如同刈草的暴力血腥的本质并未改变。历代革命或某种程度上说即政权的更迭，无不是以人民的生命为代价的。《史记·周本纪》里提到一场战争，动则发兵数万人，灭城灭国往往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史记·项羽本纪》里载楚军夜击坑秦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7页。

卒 20 余万人于新安城南,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当然这里所列战争,显然不同于现代意义的革命。但大凡一种政治势力在谋取一个政权时,多是以暴力的手段来完成的,且往往以革命的名义来进行。革命这一神圣的词语,早在周文王、周武王时代就已经是反抗者反抗现有统治者的最好理由。然而即使革命如此早地就已经确立了其反抗的合法性,然而其所引发的争论其实并未停止过。《史记·儒林列传》有段对话颇有意味,这段对话发生在汉景帝面前,对话者为清河王太傅辕固生与黄生之间。原文是这样的:“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①汤、武革命的事实,在汉景帝时代无法得到统治者的确证。辕固生与黄生各自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在讨论革命的本质,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具有合法性,理由是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顺天应人是汤、武革命的合法性所在。而黄生反驳的理由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即臣下不能犯上,君臣之道必须遵守,否则为弑。而辕固生最终以汉高祖灭秦的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即“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这给汉景帝出了个难题,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二维层面

①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96 页。

考虑,似乎革命是一柄双刃剑,站在现实的角度,景帝希望革命最好不要发生,这关乎到汉家统治的安稳,因此黄生的观点正确;而站在汉家江山的合法性上来看,则轅固生的观点正确。陷入两难的景帝最终将这场争论束之高阁,以“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草草收场。显然革命作为话语言说的对象存在太多的悬疑。当然,现代性的革命远非传统汤武革命所比,但是在世纪初的革命话语里依然经历了革命合法性发生冲突与疑问的现象。有论者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如章炳麟和康有为对西方革命都感到异常恐惧^①。类似这样的心理同样也发生在孙中山早期对革命一词的拒绝,然而在世纪之交世界革命的浪潮下,孙中山先生所使用的“革命”一语越来越合乎世界潮流,自1923年孙中山先生作《中国革命史》时提及“余自乙酉中法战争后,始有志于革命”,革命即被现代造反者写进皇皇大史,显然革命的合法性是具备了。现代性的革命吻合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它是以民族独立与发展、个体自由与解放、国家政权的公平与民主、社会自然和谐及信仰的道德与科学为前提的。后来的民族革命战争、阶级革命斗争,以至于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其出发点都未离开这些现代性的宏大话语,革命成了一种联系个人与民族、国家、社会以至于关乎世界发展的神圣行为。这种神圣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间,革命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经常仪式。革命是一个跨越历史与空间的词语,其合法性经过时空的转换逐渐获得了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其血腥的一面,或者说非常态的一面。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对话录中提及“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此种过激之论,显然抹杀了一个世纪以来,革

^①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命者救民于倒悬、引民族出水火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但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也不能忽略革命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革命伦理关系。

20 世纪的中国小说,叙述革命的话语形态相当复杂。从晚清时期的虚无党小说开始,叙述革命即显现出异常诡谲的色彩,不单纯是革命者与传统家庭的决裂、革命者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表现出的舍弃小我的牺牲精神,以及革命者的道德伦理对性爱等个体欲望的排斥等,单是革命故事的传奇性与革命者的道德境界,也无疑让读者侧目。在革命烽火连三月的晚清乱世,曾出现了一批翻译、仿制革命虚无党的小说,然而这批小说当其时却具备了盛世时代大众通俗小说的娱乐因子,单就这一点,亦颇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文学的叙述与时代的关系可谓奇妙至极。一面是革命者现实的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一面又是作家之流叙述的猎奇与浪漫。而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幻灭后,有关革命故事的叙述即变得日益阴柔与晦暗,此类小说可以茅盾的《蚀》三部曲为代表。虽然作者其后的《虹》以及后来者蒋光慈等对革命所作的粗野叫喊,亦无法改变这个时期叙述革命的阴柔气。相比较晚清时期的革命小说诸如《警世钟》等,此类小说缺乏革命的壮怀激烈,而是以性爱为核心,革命不过是性爱人物活动的背景与舞台,深陷革命的青年男女,在表达革命的情愫时,牵强的叙述居多,而个人的情与爱反而更吻合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所以,众多论者普遍认同它们是革命加恋家的小说,是有关个人利比多的叙述,革命只是叙述男女情爱的一块招牌。五四洪流大浪淘沙,少有人不遭到沉落的命运。遭到五四激进大潮以及晚清民初革命洪流冲击的作家们,他们在叙述革命或者革命背景下的人生时,无不带着伤痛与个人的深思。鲁迅在其《药》里看到了辛亥革命脱离大众的失败结局,革命者的鲜血成了庸众治病的药,狱中夏瑜的革命宣传,却被当成时代的狂人呓语,是民众万万不能理解的疯话;而《阿 Q 正传》里的阿 Q 的

革命史,不仅暴露了咸与维新的失败,也反应了民众的革命目的、革命手段的缺陷。阿Q的革命只是洋钱、洋纱衫、宁式床等物的占有,以及对吴妈及其女儿及秀才娘子等女性的占有,同时还有对乡村民众的作威作福,而阿Q式的革命手段则是血腥的鞭打、破坏性地砸庙里的古物以及为所欲为地掐摸大家都忌讳的尼姑的脸蛋。农民革命的问题,在阿Q这里表现出中国革命走上康庄大道的极端艰巨性,后来的小说,如《差半车麦秸》、《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农民革命的劣根性都不乏阿Q的影子,小说里农民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在十七年文学里了。因为政治话语对文学创作的左右,农民一夜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如《红旗谱》里的朱老忠、《创业史》里的梁生宝、《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而知识分子的革命在鲁迅小说里也得以真实而又痛苦的表现,早年激进的魏连受到后来投身所厌恶的军阀做顾问,早年砸孔庙的吕纬甫最后陷入庸碌无为的日常生活,如苍蝇一般旋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这些都无不显示出知识分子走上革命之路的漫长,知识者的革命需要涤荡自身的缺陷,这一工程在延安时期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中依然存在知识分子的间性,而进入十七年后,特别是《青春之歌》的出版,标志着知识者投身革命已改正了这类群体身上所有的缺陷,即完成了知识分子向革命者身份的转换。其后的《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成岗等,已看不到知识分子的特征,因为有知识分子缺陷的代表人物甫志高已被双枪老太婆给毙了。甫志高之死意味着知识分子不适合革命的特性在革命小说中已被抹去。可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境遇里知识者所表现出的间性却是异常强烈,无论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还是茅盾在《蚀》三部曲里所表现出的知识者的颓废,或者是蒋光慈在《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小说里所表现出的性与爱失落的痛苦或欢欣,无不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与知识分子主角在革命舞台上的清晰影像。革命中的农民与知识者,是20世纪小说里表现得最

为突出的两类人。叙述人的立场与伦理姿态,人物的革命伦理背景与伦理遭遇,是20世纪小说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里有知识者话语与政治主流话语、革命伦理与传统伦理、性爱伦理与革命道德、传统父子伦理与革命恋父情结、民族国家叙事与个体生命小叙事,等等,其中蕴藏了复杂的权力话语的冲突与调和。

作为社会非常态阶段的革命,恰恰是人类喜欢讨论和诉说的对象。革命常是史家、文学家以及乡村野老、市井小民反复叙述的话题。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革命成了世纪百年最关键的主题词。文学是如何叙述革命的,革命话语蕴含着什么样的主题,革命历史情境中的爱与恨、英雄与美女、崇高与卑鄙,以及革命与宗教、革命与伦理、革命与历史、崇高的革命与卑微的日常生活,还有叙述革命的文本内与文本外等,无不是我们关注与讨论的对象。本著将世纪百年对革命的关注落实在20世纪文学,主要是当代小说的叙述上,注重从革命情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去探讨,这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伦理命题。伦理者,社会价值体系中人之生存状态也,它是历史与现实互渗的社会生活方式,一种合乎生命价值、历史文化沉积及现实道德图谱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历史非常时期的革命阶段,合乎传统的伦理关系常被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生活状态、新的情感取向、新的道德境界、新的生命需求等所夹击,革命境遇中的生命形态或者说伦理形态异彩纷呈,奇艳无比,可以说是百年小说审美场域里最为诡谲的一道风景。

小说叙述革命,理所当然地离不开对革命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所以,小说叙述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叙述革命境遇中人的伦理状况,它既包含了革命主人公的欲望、兴趣、目的及革命过程中的行为与方式,也涵盖了革命背景下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及对革命的大恐惧与大欢欣,当然也不乏叙述者所持的价值立场与叙事姿态。伦理既是外在的,也是生命内在的一种诉求。刘小枫先生曾论及伦理的两种形态,即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

由伦理的个体小叙事。而其所谓的伦理指的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受,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受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受就有多少种伦理^①。所以,对 20 世纪小说中革命叙事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对革命境遇下个体生命感受的探讨。革命时期作为历史行程中的非常态,其间人的伦理状态也存在非同寻常的一面,许多小家作者都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创作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这一母题,他们从伦理的角度深化了革命叙述形态的复杂性,转而又在叙述革命历史与革命背景时突现了人之伦理状态的复杂性,从而去实践文学是人学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

①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 页。